

北京图书馆藏善本书叙录（四）

李致忠

尚书正义二十卷 唐孔颖达撰 南宋初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卷七至卷八，卷十九至卷二十配日本影宋抄本） 杨守敬跋。

此本匡高21.5厘米，广15.5厘米。每半叶八行，每行十六、十七、十九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此为《尚书》经、注、单疏合刻第一本。但它究竟刻于何时，出自谁手，历来说法是不尽一致的。

此书乃杨守敬从日本购回者，今藏北京图书馆。卷首有杨守敬长跋，跋称：“宋槧《尚书注疏》二十卷，末有绍熙壬子三山黄唐题识，称‘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云云。是合注于疏自此本始，十行本又在其后。惟十行本板至明犹存，世多传本。此则中土久亡，唯日本山井鼎得见之，载入七经孟子考文。顾其原书在海外，经师征引疑信参半。余至日本，见森立之《访古志》有此书，竭力搜访。久之，乃闻在西京大阪人家。嘱书估信致求之，往返数四，议价不成。及余差满归国，道出神户，亲乘轮车至大阪物色之，其人乃居奇不出。余以为日本古书，有所见则必得，况此宋槧正经正注为海内孤本，交臂失之，留此遗憾！幸归装尚有余金，乃破慳得之。同行者皆待于神户，方诧余独自入大阪，及携书归来，苍皇登舟，莫不窃笑癖而且痴，而余不顾也。书凡装十册，

缺二册，钞补，亦是以原书影摹，字体行款毫不改易，固不害为全书也。”

又称：“黄唐跋是绍熙壬子。七经孟子考文于《礼记》载此跋，误‘熙’为‘兴’，阮氏校勘记遂谓合于注疏在南北宋之间，又为山井鼎所误。此附订于此。光绪甲申四月廿五日神户舟中挑灯记。宜都杨守敬。”

杨氏这道长跋，将此书得来的经过叙述得清清楚楚，且读之令人起敬。然其关于此书版刻的年份；正经、注、疏汇刻的肇始；指斥阮元为山井鼎所误而“遂谓合疏于注在南北宋之间”等，则是完全搞错了。

此书卷尾有后人移录的黄唐跋文，称：“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阙。绍熙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侵诸木，庶广前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贻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这道跋文是否当为《尚书》所有，留待后边再讲。就算此跋真的是刊于《尚书》卷尾，那也得不出此书刊于绍熙壬子的结论。这里边有个对跋文理解和对黄唐其人的考实问题。

黄唐跋文称：“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庶广前人之所未备。”这段话的意义很清楚，它是说本司（指两浙东路茶盐司）旧时曾经刊印过《易》、《书》、《周礼》经注疏合刻本。绍熙辛亥仲冬，当黄唐来提举本司时，则将《毛诗》、《礼记》疏义仿前三经编汇，用侵诸木。就是说，两浙东路茶盐司早在黄唐提举本司之前，便刊印了《易》、《书》、《周礼》三经，到黄唐备员本司时，这三经已经成了他效法的典范和继承发扬本司的优良传统。所以当

黄唐来提本司时，便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用侵诸木。显见，《尚书正义》的刊印绝不会出自黄唐之手，而是出自远比黄唐要早的两浙东路茶盐司。杨守敬把此书说成是黄唐刻本，并肯定地说“是合注于疏自此本始”，显然是错误的。其指斥阮元为山井鼎所误虽对了，因为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引证黄唐跋文，误将绍熙改为绍兴。但其纠正阮元“合注于疏在南北宋之间”，而谓始于绍熙黄唐所刻《尚书正义》，则是以误正误了。

傅增湘先生曾在常熟罍里瞿氏铁琴铜剑楼看过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周易注疏》，并在其《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做了记录。其按语称：“此（指《周易注疏》）与袁抱存克文藏《礼记》、张香涛之洞藏《书经》、李木斋盛铎藏《周礼》同，皆绍熙黄唐刻本也。”傅先生盖无意附议杨守敬之说，但其笼统地将《易》、《书》、《周礼》、《礼记》都说成是黄唐刻本，显然也是不对的。上面的分析已证明了这一点。

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还有过一篇冗长的议论，虽未必有意为阮元张目，但用心绝对是想驳斥杨守敬。叶氏称：“杨《志》载有宋刊《尚书注疏》二十卷，云南宋绍熙间三山黄唐题识，是绍熙壬子刻。阮氏校勘记为山井鼎所误。然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亦载有此本，卷末有题记，文独完全。云‘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绍兴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其刊刻年号亦作绍兴辛亥。其书即足利所藏，是森氏所见之书，为当日山井鼎所见之书。同一绍兴所刻注疏，何至杨所见独为绍熙！辛亥、壬子相距一年，刻成始识，情事之常。而绍熙误作绍兴，则去之太远。窃疑杨所见不甚可据，故误绍兴为绍熙，非考文误以绍熙为绍兴也。况杨所见十册内有抄补二册，非森氏所见之全，则其所据之本不足以难阮氏。而杨之以

不误为误，不足令人征信矣。”叶氏在这里没提出任何根据，只是空信山井鼎引文，而不相信杨守敬引文，硬说黄唐跋文写于绍兴年间。

前面诸前辈，将黄唐刻书的时间前推也好，后移也好，在于对黄唐的行实失于考证。考黄唐，字雍父。福州人。自称三山人，亦称长乐人。按：三山即今福州。宋曾巩《道山亭记》，称福州城中有三山：东曰九仙，西曰闽山，北曰越王，故郡有三山之名。其跋文落款自称“三山黄唐”，其实指的就是福州。《南宋馆阁续录》又称其为长乐人，其实长乐亦是福州府属县。汉置，隋为闽县地，五代梁王氏改曰安昌，唐复旧，晋又改曰安昌，寻复为长乐，清属福州府。故虽系长乐人，就大地名言之，亦可称为福州人。

黄唐生卒年很难稽考，但从其主要的活动，亦可大体断定其写跋的年代到底是绍熙还是绍兴。据《南宋馆阁续录》卷八载，淳熙十年（1183）七月黄唐除为校书郎；十二年（1185）二月除为秘书郎；十三年（1186）正月除为著作佐郎；十五年（1188）三月除为著作郎；十六年（1189）八月知南康军；庆元二年（1196）六月以考功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十二月又为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仍兼原职。《南宋馆阁续录》的这段记载，反映了黄唐的主要活动时期似当在淳熙十年以后，且是从校书郎、秘书郎、著作佐郎、著作郎、知南康军、考功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兼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等，呈阶梯式逐级晋升的。假定他在绍兴辛亥（元年1131）就做了两浙东路茶盐司提举，且主持刊印了前述诸经；并于第二年，即绍兴壬子撰写了前边所引述的那道跋文，那么何以到了五十二年后的淳熙十年，反倒才做了个小小的校书郎呢？从上述记载看，淳熙十年很可能是他步入官场的开始，经过二十余年的宦海生涯的搏斗，最后才以考功郎中的职衔兼做了实录院检讨官和枢密院诸房文字检详官。这种无庸置疑的

事实，可以证明他在绍兴辛亥还没有诞生呢！试问没有出生问世的黄唐，何谈什么“备员司庾”，又何谈什么刊印上述诸经呢？

且考康熙《绍兴府志》，绍兴二年（壬子）的两浙东路茶盐司提举根本就不是黄唐，而是李沐。而绍熙二年（辛亥）两浙东路茶盐司提举则恰恰正是这位黄唐。这不但可以补《南宋馆阁续录》关于黄唐记载中绍熙元年（1190）至五年（1194）行实的缺疑，而且与其跋中所称的年份也恰恰暗合。这就进一步证明其刊印《毛诗》、《礼记》注疏，正是在其“备员司庾”的绍熙辛亥（二年）十一月开始的，到第二年（壬子）秋八月完成。叶德辉氏所谓“辛亥、壬子相距一年，刻成始识，情事之常”，拿来用在这里，倒实在再恰当不过了。上述诸前辈在这个问题上致误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上的藏书分散所造成的。这使他们没有条件把有关的书汇集在一起，进行勘核比较，做系统地综合研究。

那么《尚书正义》的经、注、疏合刻本到底是刊于何时呢？这个问题，通过前面的分析和考证，我想应该是好解决了。

前边所引黄唐《礼记》跋文，已明确指出《易》、《书》、《周礼》正经、注、疏之合刻，是两浙东路茶盐司旧时进行的。但这旧究竟应该是旧到何时呢？从下列事实看，我想应该旧到南宋高宗赵构在位的三十六年（1127—1162）中。根据有二。

一、此书避讳至高宗赵构而止。书内凡遇殷、弘、敬、匡、恒、贞、桓、构等字皆缺末笔，以示避讳。殷、弘、敬等字是避宋朝的远祖讳；匡、恒、贞、桓等是宋朝皇帝嫌名讳；构字当是彼时在位皇帝的御名讳。慎字不避，表明此书之刻未到南宋孝宗之时。宋代刻书避远祖及已故北宋皇帝名讳是常见的通例。关键是讳字所避的最后皇帝的名讳，和所不避的下一个皇帝的名讳。两者前后一挤，其刻书时间大体上就能定下来。此书所避的“构”字是南宋高宗皇帝的御名；此书所不避的“慎”字是南宋紧承高

宗之后孝宗的嫌名。这样一来，就证明了此书之刻当在南宋高宗之世。

二、此书刻工颇多，但大都为同时期刻字工人。如李实、李询、陈锡、陈安、陈俊、王珍、朱明、徐茂、丁璋、包端、洪先、毛昌、洪乘、徐颜、徐亮、朱静、徐章、梁文等，皆是南宋初年杭州地区刻书良工。其中如朱明、徐茂、毛昌、梁文、陈锡等，还参与槧刊了两浙东路茶盐司主刻的《周易注疏》。宋代杭州地区的刻书在质与量等方面都居全国的首位。而杭州与绍兴只一江之隔，刻字工人可自由交流。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公署在越州，越州即今绍兴。茶盐司是专管茶盐税收的，是肥缺，故其刻工不但聘请良工，而且刻书的书品也很讲究。现在所知该司所刊五经疏义，每行字数虽然不尽相同，但每半页的行数均为八行。所以看去行格疏朗，字大如钱，古朴端庄。在古书版本鉴定中，根据刻工进行考定，通常是比较可靠的。此书刻工既为南宋初年杭州地区良工，则进一步证明此书之刻亦当在南宋初年。

综合上述两点，则此书之刻绝非如杨守敬所说是出自什么绍熙间黄唐之手，而应定为南宋初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

此书首有宋端拱元年（988）都勘官朝请大夫守国子司业赐紫金鱼袋臣孔维等进书表。又有唐长孙无忌等上《五经正义》表。又有孔颖达《尚书正义》序。卷八末尾有“上枚安房守藤原宪实守进”一行，行尾有画押，似是日本人。全书经文旁多有日人所标假名。表明此书确曾藏于日本。清光绪十年（1884），杨守敬出使日本差满归国，用重金从日本大阪购回，今归北京图书馆。此书首册钤有“飞青阁藏书印”、“杨星吾东瀛所得秘笈”可证。

此书二十卷，卷七、卷十九、二十为日人据日本足利学校所藏同本影抄配全。唯最后之黄唐跋文，似不该为足利藏本《尚书正义》所原有，这在前边已经论证过了。黄唐不可能给《尚书正义》写跋，因为当《尚书正义》刊刻时，黄唐还未必出生呢？

现在，黄唐于两浙东路茶盐司任上所主刻的《毛诗》虽已亡佚，但《礼记》犹存，且亦藏于北京图书馆。取《礼记》后所刻黄唐跋文与《尚书》后所影抄黄唐跋文相勘比，行款字体虽宛若一辙，然《礼记》跋文有界行栏线，为半页十二行，《尚书》跋文则无界格。证明《尚书》后之黄唐跋文，定为后人从《礼记》后所移录，就此辨之。

周礼疏五十卷 唐贾公彦等撰 南宋初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

此本匡高21厘米，广15.8厘米。每半页八行，每行十五至十七字不等。注文双行，每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双边。南宋绍熙三年（1192）两浙东路茶盐司提举黄唐刻《礼记正义》跋称：

“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其中所说的《周礼》，指的即是此本。此为《周礼》经、注、单疏合刻第一本。

卷中刻工大约分为三期：徐亮、梁济、朱明、陈锡、徐茂、梁文、王珍、丁璋、毛昌、洪乘、陈高、洪新、黄琮、李宪等，均是南宋初叶杭州地区的刻字良工。此为第一期刻书工人。其中如朱明、徐茂、梁文、陈锡、毛昌、丁璋、洪乘等，都同时参与了《周易注疏》和《尚书正义》的刊刻工作，证明此书亦当初刻于南宋初年。王恭、宋琚、方至、方坚等，为南宋中叶补版工人，此为第二期。证明此本至南宋中叶版片已有破损，故重印时不得不加以修补。郑野、何厚、徐渊、陈天锡、何建、李宝、任阿伴、徐友山、李德瑛等为第三期，均为元时补版工人。证明此书版片至元时破损更加严重，故重印时只好再次修补。也证明此为元时印本。其中如李德瑛亦参与修补过《周易注疏》的版片。何厚参与修补过《礼记正义》的版片。表明宋时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五经版片，到元时可能统一修补重印过。上述三个不同时期的

刻工，足可证明此书始刻于南宋初年，重修于南宋中叶，再修于蒙元，因定此书为南宋初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

此本传世凡三帙：一为商丘宋牧仲旧藏，仅存二十七卷，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二为故宫博物院藏本，当年傅增湘先生在故宫曾亲眼看过，并做了如下的描绘：“《周礼疏》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陆德明释文。宋浙东茶盐司刊本。八行十五字，注文双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双栏。卷帙完整，纸幅宽展，惟间有元代补刊之页。”后来董氏诵芬室影刻此书，即据上述两帙择善而用之。第三即是此帙，今藏北京图书馆。

北图所藏此本，原为朱氏结庐旧藏。字大行疏，开幅宽展，的是宋时旧第。中华书局根据古籍整理规划，拟将宋时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五经（《毛诗》已佚）及庆元间绍兴府知府沈作宾主刻之《春秋左氏传》汇集到一起影印行世。如果此项计划能够实现，则五经（《毛诗》因亡佚除外）经、注、单疏合刻的最早版本，均可再现于世。此举非但可使七百多年前的旧刊得以原样流传，于古代经学的研究亦将大有裨益。

礼记正义七十卷 唐孔颖达等撰 宋绍熙三年（1192）两浙东路茶盐司提举黄唐刻宋元递修本 惠栋、李盛铎、袁寒云跋。

此本匡高21.3厘米，广15.8厘米。每半页八行，每行十四字、十六字、二十一字不等。注、疏文双行，每行二十一、二字，二十六、七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此为《礼记》经注单疏合刻第一本。卷末镌有黄唐跋文，称：“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缺。绍熙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椴诸木，庶广前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倾力未暇，姑以贻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

黄唐谨识。”跋后是“进士傅伯膺、进士陈克己、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庄冶、修职郎绍兴府会稽县主簿高似孙、迪功郎充绍兴府府学教授陈自强……。”等参校官衔名八行。又有“宣教郎两浙东路提举常平司干办公事李深、通直郎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王汾、朝请郎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司公事黄唐”等校正官衔名三行。

黄唐刊本《礼记正义》，非但是《礼记》经注疏合刻的第一本，也是海内仅存的一帙。刻工马林、马祖、马松、马祐、马春、毛俊、毛端、葛昌、葛异、方伯祐、方坚、徐仁、徐宥、徐进、徐通、王佐、王允、王恭、王宗、王茂、王椿、王祐、王祐、王示、王寿、李宪、李师正、李涓、李彦、李仁、李光祖、李良、李倚、李信、李用、李忠、李成、周全、周泉、周彦、周珍、高彦、高政、高文、高异、许贵、许才、许詠、许富、陈彦、陈文、陈显、陈真、陈又、施俊、施珍、蒋伸、蒋信、蒋晖、张昇、张枢、张晖、张荣、吴宝、吴宗等等，皆南宋时刻工。茅文龙、蒋佛老、陈琇、郑闰、何厚、何庆、张阿狗、俞声、郑野、李德英等等，皆元时杭州地区补版工人。证明此书在元朝曾补版重印过。

此书凡遇玄、纭、弦、眩、县、頰、警、敬、鸞、竟、镜、弘、殷、匡、筐、胤、炅、恒、禎、侦、禛、征、让、署、树、竖、頊、鬲、桓、完、构、拘、媾、慎、蜃、惇、敦等字，皆缺笔避讳。证明此书的确刊于宋光宗赵惇绍熙年间。

此本不但在《礼记》研究上具有相当高的版本价值，更要紧的是此本完整地保留着黄唐刻书跋文。这道跋文澄清了过去关于《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周礼疏》刊刻时间上的混乱。透过这篇跋文，我们完全可以搞清楚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刻五经疏义的来龙去脉。这就是：在南宋初年，约当高宗绍兴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刻了《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周礼疏》

三经注疏。至光宗绍熙三年，由黄唐主持，该司又刊印了《毛诗》和《礼记》注疏二经。今《毛诗正义》已亡，黄唐所刻经书存世者只剩此书而已。

据康熙绍兴府志记载，绍熙二年黄唐出任两浙东路茶盐司提举。此书黄氏跋文亦称“绍熙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两者正相契合。又据《南宋馆阁续录》载，黄唐字雍父，上舍释褐出身，治《易》。适见黄唐于经书研治是饶有兴趣的。绍熙间他来提两浙东路茶盐司时，该司早已刊印了《易》、《书》、《周礼》三经注疏，故当他下车伊始便刻意主刊《毛诗》、《礼记》二经，仅用十个月时间，到第二年八月便完成了。故黄唐所刻《礼记正义》之传世，其价值绝非只限于此书本身，其于搞清该司前后所刻经书的史实经过，意义亦是不可低估的。

今此本各卷均钤有“秋壑图书”印记。按“秋壑图书”为南宋权相贾似道的印鉴。贾似道权奸出名，其藏精本图书、碑帖、书画、古器物也很出名，廖莹中就是给贾似道鉴别图书版本的门人。惜此印盖为后人伪作，不可据以为信。

此本又有“季印振宜”、“沧苇”、“御史之章”等印记，表明此书到清初尝为季振宜收藏。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泰兴人。顺治进士，官至御史。故上述几印都是他的藏书印鉴。季家藏书亦极富。此本《礼记正义》就是其中之一。

又有“北平孙氏”，盖指孙承泽。又有“惠栋”、“定宇”等藏印及跋文，故此书又尝为惠栋所藏。惠栋字定宇，号松崖，人称小红豆。又有“孔继涵”、“金章世系”、“小如庵秘笈”等印记，表明此本又曾为曲阜孔继涵所藏。又有“寒云”、“袁克文”等印记，表明此本又曾为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所藏。

《宝礼堂宋本书录》称：“阮文达校勘记谓是七十卷本为惠氏校汲古阁所据。”今证以惠栋跋文，信此说不诬。又称此本“先为吴中吴泰来家所藏，后归曲阜孔氏。陈仲鱼亦有是言。”

今证以孔继涵藏印，此说亦不诬。又称“其后由孔氏入于意园盛氏。”盛氏指盛昱，意园是盛氏的斋号。又称“盛氏书多为景朴孙所搜。”今证以袁寒云跋文所称“盛昱书散出，即归其戚景贤”语，此说亦不诬。

透过上面的分析，适见此本自清初以来其递藏线索还是十分明了的。袁寒云是袁世凯的儿子，附庸风雅，以藏书为事。袁世凯死后，袁寒云移居上海，家道中衰，只好卖书。此时正值潘氏宝礼堂经商起家，故袁氏藏书不少归之于宝礼堂，此本即为其中之一。潘氏得此本后即据以影刻行世，以广流传。八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第一版披露一条消息，标题是“海内珍本《礼记正义》重印出版”。并说“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海内珍本——景宋本《礼记正义》，最近由中国书店重新刷印出版。”云云。这条消息初读使人欣喜，继而细想则此版原书还依然存世，且根据古籍整理规划，中华书局准备依原书影印出版，收入《古逸丛书》三编中。这样一来岂不出重了吗？且两相比较，以原书影印无论是内容还是版本，都将比潘氏影刻者更为珍贵。若能有人出来协调平衡，而后决定去取，将是极好的事情。

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 唐孔颖达等撰 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绍兴府刻宋元递修本。

此本匡高21.2厘米，广16.3厘米。每半页八行，每行十五、六字不等，注文双行，每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刊工姓名。卷一、二、十六、十七、十八、三十四、三十五后俱有“修职郎新差充婺州州学教授赵彦稹点勘”一行。卷七、八、九、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后俱有“乡贡进士冯嗣祖校勘”一行。卷尾有“经传正义都计壹百肆万壹千五百三十字，经传叁拾陆万字，正义陆拾捌万壹千伍百叁拾字”一行。又有“承奉郎守光禄寺丞臣赵安仁书；勘官承奉

郎守国子礼记博士赐緋鱼袋臣李觉，勘官承奉郎守国子春秋博士赐緋鱼袋臣袁逢吉，都勘官朝请大夫国子司业柱国赐紫金鱼袋臣孔维，详勘官登侍郎守高邮军高邮县令臣刘若讷，详勘官登仕郎守将作监丞臣潘宪，详勘官朝请大夫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陈雅，详勘官朝奉郎守大理正臣王炳，登仕郎守大理评事臣王焕再校；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邵世隆再校；中散大夫守国子祭酒兼尚书工部侍郎柱国会稽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孔维都校，淳化元年庚寅十月日。推忠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参知政事上柱国太原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二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臣沔等进，推忠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参知政事上柱国陇西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二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臣辛仲甫，起复推忠协谋佐理功臣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东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三百户食实封六百户臣吕蒙正”等校正官衔名若干行。此为《春秋左氏传》经注单疏合刻第一本，也是传世的唯一孤本。

我们在前边讨论《礼记正义》的版刻时，尝征引过南宋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司提举黄唐的跋文。其跋文最后称：“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贻同志云。”这是黄唐对他以后的人提出的希望。在黄唐写完这道跋文（其跋写于绍熙三年八月）的第二年，即绍熙四年（1193），便有给事中汪义端来知绍兴府。汪氏继承厥志，取国子监《春秋经传集解》、《正义》，参以闽、蜀诸本，俾其僚属等相与校讎，毋敢不恪。且亲自审阅，小有讹谬，无不订正，故其书纯全，独冠他本。并不惜帑金，鸠工梓行。奈事未完成，中途离去。到庆元四年（1198），俞丰以提点刑狱司身分来帅浙东，知绍兴府，加意完成汪义端关于此书的未竟事业。不料，又未毕而离去。庆元五年（1199），沈作宾由绍兴府通判升为绍兴府知府，始卒成其事。

此书最后刊印完成，在庆元六年（1200），距汪义端最初经

营此事已有八年。故当此书刊刻即将竣事时，沈作宾写了一道后序，比较详细地回顾和叙述了此事的前后经过。原镌在此书卷尾，现已脱佚，顾其有裨于此书的版本考定，特从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中移录于此。

“中宾（中字宋本甚模糊，或是作字，姑以意定）叨蒙异恩，分闾浙左。仰体圣天子崇尚经学之意，惟恐弗称。访诸僚吏，则闻给事中汪公之为帅也，尝取国子监《春秋经传集解》、《正义》，参以闽、蜀诸本，俾其属及里居之彦相与校讎，毋敢不恪。又自取而观之，小有讹谬，无不订正，以故此书纯全，独冠他本。不憚广费，鳩工集事方殷而遽去。今检正俞公以提点刑狱兼摄府事，亦尝加意是书，未毕而又去。中宾窃以为《春秋》一经，褒善贬恶，正名定分，万世之权衡也。笔削渊奥，虽未易测知，然而左氏传、杜氏集解、孔氏义疏，发挥经功不细。萃为一书，则得失盛衰之迹，与夫诸儒之说，是非异同，昭然具见。此前人雅志，继其后者庸可已乎！遂卒成之。诸经正义既刊仓台，而此复刊于郡治，合五为六，炳乎相辉，有补后学，有裨教化，遂为东周盛事。昔熙丰大臣疑是经非圣哲之书，不列于学官，识者痛之。中兴以来，抑邪论，尊圣经，乃复大显，以至于今。世运所关，不可以无述也，于是乎书。庆元庚申（六年）二月既望，吴兴沈中宾谨题。”

按：沈中宾，本为沈作宾，宋版书“作”字印得模糊，被后人误为“中”。沈作宾，字宾王，吴兴归安人。《宋史》沈作宾传，称其以父任入仕。庆元初，历官至淮南转运判官，以治办闻。擢太府少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继升为卿。寻除龙图阁，帅浙东，知绍兴府。”根据康熙《绍兴府志》载，沈作宾先作的是绍兴府通判，时“太守丘密待僚属甚严，作宾从容裨赞，每心宽和济之。庆元中迁为守。”再据该志郡守中所载，知沈作宾知绍兴府事在庆元五年。依此，再去考察其跋中所说的给事中汪公之

为帅也，这个汪公指的当是汪义端，他于绍熙四年尝知绍兴府事。检正俞公则指的就是庆元四年知绍兴府事的俞丰。这两位绍兴郡守尝先后用心于《春秋左传正义》的刊刻，但都未完成，最后才由沈作宾竣事。

沈氏后序中尝提及“则闻给事中汪公之为帅也”；“今检正俞公以提点刑狱司兼摄府事”；“诸经正义既刊于仓台，而此复刊于郡治，合五为六，炳乎相辉”等语，其中有为帅、提点刑狱司、既刊于仓台等提法。按南宋时各地安抚使可称为帅，故给事中汪义端来抚绍兴府亦称为帅，其府治亦可称为帅司。相应，转运使司亦可称为漕司，提点刑狱司亦可称为宪司，提举常平茶盐司亦可称为仓司或仓台。故其后序中所谓“诸经正义既刊于仓台”，指的就是两浙东路茶盐司自南宋初年到绍熙三年，先后刊印的《易》、《书》、《周礼》、《毛诗》、《礼记》等五经正义。现在这五经正义中除《毛诗正义》亡佚外，其余四经正义都还流存于世，且都藏于北京图书馆。

其实，两浙东路茶盐司也在绍兴，绍兴府郡治也在绍兴，是设在同一地的两个不同机关。故当黄唐于绍熙三年以两浙东路茶盐司提举身分，主持刊印了《毛诗》、《礼记》之后，继之刊印《春秋》者，为绍兴府郡守汪义端、俞丰、沈作宾等，他们从绍熙四年起，前后用了八年时间，最后由沈作宾完成于庆元六年。故《易》、《书》、《周礼》、《毛诗》、《礼记》、《春秋左传》等六经的经注单疏合刻之第一本，都是由绍兴一地完成的。绍兴古称越州，故越州本六经正义，为历来经学家和版本家所推重。

此本《春秋左传正义》刻工可分为二期：丁拱、何升、方坚、葛昌、方至、金滋、李信、刘昭、李师正、李倚、宋琚、孙日新、许成之、方茂等为第一期，均系南宋中叶杭州地区刻字良工。其中宋琚、方至、方坚等还参与过《周礼疏》的补版工作。郑野、徐友山、何庆、缪珍、张狗、徐渊、赵遇春、陈琇等为第

二期，系元时杭州地区补版工人。这些人也都参与补修过越州所刻其他经书。故证明此书在元时是重修过版片的。

此本原传世有两帙，一帙为苏州朱文游所藏，一帙即北图所藏此本。朱文游名夔，精于鉴藏。朱氏藏本为阮元作《十三经校勘记》时所利用。阮氏《春秋左传正义》校勘记中称：“宋本《春秋正义》三十六卷，宋庆元中吴兴沈作宾所刊。……无附释音，字无俗体，是宋刻正义中之第一善本。……经传下载注不标注字，正义总归篇末，真旧式也。今校勘记依此分卷。”然朱氏滋兰堂藏书早在清朝就已散亡，此本《春秋左传正义》也随之流散，不知是否尚存天壤间？

北图所藏此本今为世间仅存之本。清初为季振宜家藏书，今有“季印振宜”、“沧苇”、“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等印记可证。又有“昆山徐氏家藏”、“乾学”、“徐健庵”等印记，《传世楼书目》亦有著录，足证亦曾为徐乾学插架之物。又有“北平孙氏”一印，盖亦曾为孙承泽收藏。民国初年辗转为上海涵芬楼所得，今有“海盐张元济经收”及“涵芬楼”印记可证。最后归北京图书馆珍藏。此书各册均钤有“秋壑图书”一印（贾似道印记），盖为后人伪造，不可据以为信。

纵观上述所说诸经的版刻，均是南宋初年到南宋中叶浙东路绍兴地区刻本。而六经正义所用的刻字工人又都是杭州地区刻字良工，而每经又都是各经经注单疏合刻的第一本，且除《毛诗正义》之外，五经都还流传于世，并集中珍藏于北京图书馆。故北京图书馆愿与中华书局相协作，将这五经都能同时影印行世，完成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所规划的任务。